

古玩口口監秘要

子之言
子起曰
下席曰
問也孔
語明主之
也難是以

大戴禮記卷第

毛力
著



言第三十九

子閒居曾子

言之間也其至

兵不出而死乎痕

不應曾子懼肅然

子之間也難是

而立孔子曰參



古玩鑒定
品級善本
秘要

韦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古籍善本/韦力著. —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7.6

（古玩品鉴秘要系列）

ISBN 978-7-5393-1790-8

I. 古… II. 韦… III. 古籍—善本—版本鉴定—中国
IV. G256.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9618号

古籍善本

作 者：韦 力

责任编辑：卢为峰

出版发行：福建美术出版社

印 刷：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9

版 次：200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书 号：ISBN 978-7-5393-1790-8

定 价：48.00元

目录



CONTENT

上编 知识篇

一、古书的分期及简史 ······	1
二、藏书起源及历代王朝对藏书之重视 ······	10
三、古代私家藏书概况 ······	15
四、古今善本观的异同 ······	21
五、古书版本术语选释 ······	28
六、古书的版式与装帧 ······	43
七、如何鉴别版本 ······	54
八、国外刊印汉籍的鉴藏 ······	70
九、古书的伪造方法 ······	77
十、收藏古籍工具书 ······	84



目录

CONTENT

下编 鉴赏篇

一、宋刻本	93
二、辽刻本	102
三、金刻本	102
四、元刻本	104
五、明刻本	113
六、清刻本	120
七、民国刻本	126
八、活字本	127
九、抄校本	132
十、套印本	133
十一、递修本	137
十二、影刻本	138

上编 知识篇

一、古书的分期及简史

根据我国图书发展的过程，我国书史可以分为四个人的时期：(1)从远古到公元一世纪末（远古到东汉初年）纸发明之前的时期；(2)从公元二世纪到八世纪（东汉初期到唐代中叶）印刷术发明前的写本卷轴时期；(3)从九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唐代末叶到清代鸦片战争）印刷术发明后手工业印刷术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印刷术发生和逐渐普及时期（从唐代中叶到南宋末）和手工业印刷术的发展时期（从元代初期到鸦片战争）；(4)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到现在机械化印刷术时期。最后这一时期又可再分为三个阶段：①十九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②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中

国书史的大略分期，而古书，则是指去掉第四条第三点以外的，以传统印刷及装帧方式所印就的传统文化典籍，即1949年以前出版的线装书。

现存最古的中国古书是商朝后期（殷）的甲骨文书（图1）。甲是龟甲，骨是兽骨，特别是牛的肩胛骨。文字刻在这上面，所以把这种文字叫甲骨文。因为是在殷朝首都地点发现的，所以又称作殷



1、殷墟甲骨



2、王懿荣画像

墟甲骨或殷墟文字。甲骨文先是在现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陆续发现。后逐渐流散到北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金石学者王懿荣（图2）首先发现，但现今学者也提出很多不同意见，有认为是天津孟广慧、王襄等人首先发现的，我们在此不争论这些。概而述之，这些甲骨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确定这是殷朝的一种文书，他们判定小屯村是古代殷朝的首都，甲骨是当时史官所保管的文献。据专家研究现在已发现的几万片甲骨大约反映殷王朝后期几个王朝，从武丁到纣的时候，相当于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到公元前一千一百多年左右的状况。除此之外，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和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以泛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也是书的范围。

我国最早的正式的书籍是用竹片或木板作的。所谓正式的书籍，就是指用文字写在或印在具有一定形态的专用材料上以供人阅读为目的著作物。甲骨、青铜都不

是专门作为书写用的材料。专门作为书写用的材料在我国最早的是经过整治的竹片和木板。用竹做的叫做“简策”，用木做的叫做“版牍”。因此，这种制度就叫做“简策制度”或“简牍制度”。汉代学者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量知篇》中写道：“……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汉代目录学家刘向在《别录》中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乾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此即“杀青”一词的最早出处，至今还是出版界的常用词。

以上各种文字的载体，都难以将书籍普及化，经过长期的实验及探讨，最终发明了至今还在广泛使用的文字载体——纸张。纸是中国人首先发明而后传到世界各地的，纸的发明是世界书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后汉书·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发明造纸的最早记载，即见于这段文字。而对“纸”一词的解释，最早见于许慎的《说文解字》，其称：“纸，絮-箔也”，“箔”字下说“澈絮簾也”，“澈”字下说“于水中击絮也”，“絮”是“敝绵也”。把这些字的意义连起来看，纸就是在水中漂丝绵时，将丝绵在竹席上加以捶打，而留在席上的坏丝



绵。关于纸的使用，最早见于《后汉书》，书中记公元76年汉章帝命贾逵给学生讲《春秋》、《左氏传》，给他“简、纸经传各一通”。

隋唐时期（581—907）是我国写本书的极盛时期。在这时期的后半期，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还没有成为书籍生产的主要方式。

由于手工抄写，费工费时，书籍的复本更不易多得，以至隋唐时代的写本已经没有多少被保留下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主要是靠敦煌千佛洞藏书的发现（图3）。



3、千佛洞洞窟的主室与侧室（藏经洞） 斯坦因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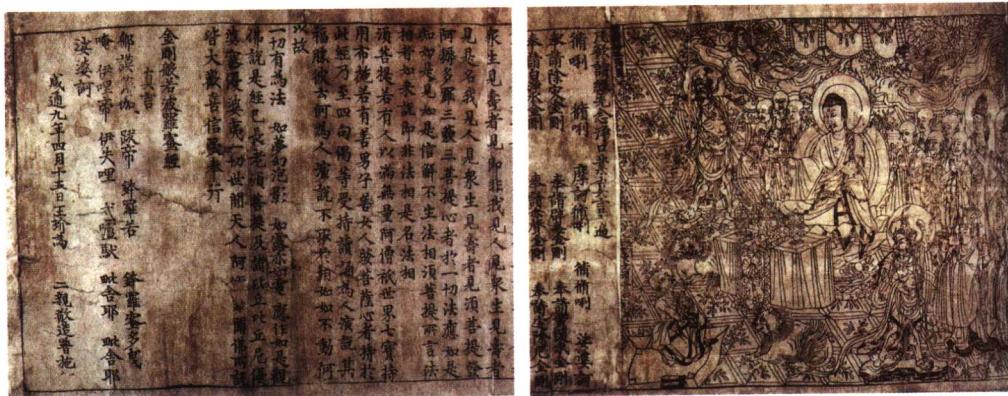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有一个王道士在修洞时，无意中发现这些宝藏，但这些宝藏陆续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买去，现都藏在英国伦敦博物院和巴黎国民图书馆。还有一些流落在我国私人手中，剩下的部分约八千多卷，到一九零九年才由清政府下令送到北平京师图书馆保存。

公元九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自此之后，印刷术成为制造书籍的主要方法，并由我国传播到全世界。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关键，雨果甚

至把印刷术的发明认为是“一切革命的胚胎”。没有印刷术，书籍就不能大量生产，知识就不能普及，人类的文化就不能有很快的进步。印刷术的发明还有汉代发明说，五代冯道发明说等等，有人认为印刷术发明于隋朝，例如：明朝的陆琛在其《河汾燕闲录》里说“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此印书之始”。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里也说，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两个人都以隋费长房所著《历代三宝记》上的记载为依据。但是《历代三宝记》原文是“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思是说雕像、撰经。陆琛误以“撰”为“造”，而认为雕造经版。这一引文上的错误，清初王士祯已在《居易录》中所指出。关于印刷术发明时期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唐代发明说，最早记录唐代刊印书的文献是元稹于长庆四年（824）为白居易《长庆集》作的序，其中说：“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又自注说：“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诗，卖于市肆之中也。”一般都把“模勒”解释为刊刻，那么，九世纪初就已有了印刷了。

现存最早的有确切记年的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雕印的《金刚经》（图4）。这部佛经末尾明白地记载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字迹。这是世界现存的最早有日期的印刷品，版本专家陈先行称此金刚为“雕版印刷第一神品”，其称：我国的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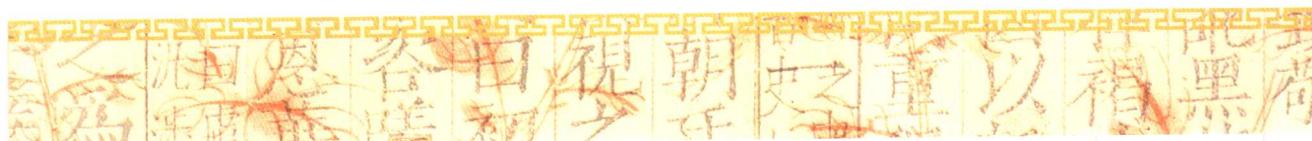
4、1900年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雕版印刷品《金刚波罗密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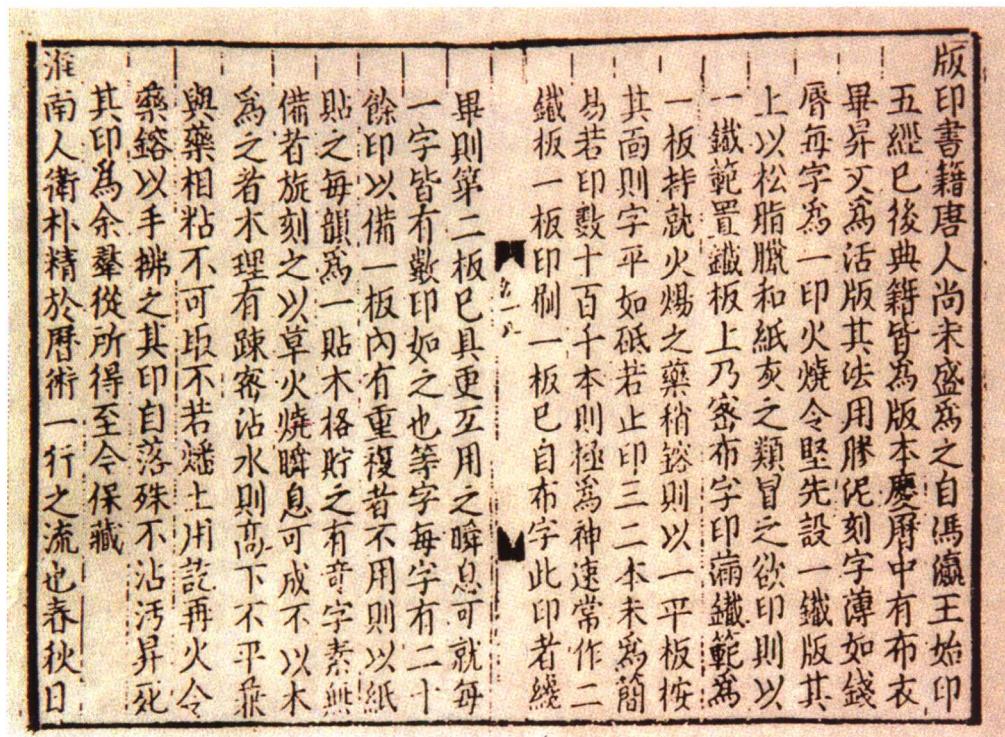
是。但自从这部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发现后，一般学者都将它视为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的一个重要实证。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两宋时代（960—1279）是雕版印刷术的黄金时代。北宋初年政府就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三部各一千卷的大参考书，又编纂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经学方面，由于注重义理，发展出理学。北宋的程颐、程灏，南宋的朱熹都是影响很大的理学家。还有与他们主张不同的王安石（北宋）、陆九渊（南宋）等等。史学方面有最著名的编年史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有郑樵的记传体《通志》。在这时期也开始了金石学（考古学）的研究。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也开始出现了目录学著作。郑樵的《校仇略》是现存最早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是开始记录各种不同版本的藏书目录。而官修的《崇文

总目》以及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都以提要著名。

在这时期不仅雕版印刷更加精美，并且发明了活字印刷。西方学者一般地都把活字印刷术认为是十五世纪中叶德国人谷腾堡的发明，并且把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术等同起来，而认为谷腾堡就是“印刷术的发明者”，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而活字印刷术实际上是公元十一世纪中叶我国毕升所发明的，在沈括著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图5）中有这样的记载：“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后世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版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





5、《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用泥活字印书的记载

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版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之。”此段记载远比谷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要早四百年，故而毕升是发明和实施活字印刷术的第一人是勿庸置疑的。

宋代刻书事业的发展，还表现在佛经的大规模的刻印。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叫张从信到成都筹刻大藏，计一千七

六部五千四十八卷，至太平兴国八年（983）才全部完成。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刻印的佛教大典（图6）。此后，神宗时福州东禅寺，徽宗时福州开元寺，高宗时潮州思溪园觉禅院都曾重刻大藏。宋代最后一部大藏是平江府碛砂延圣院从宋理宗绍定四年到元顺帝至正九年刊刻的。

宋版书是世人公认的珍本。其所以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许多著作，在今天说来，只有宋版最接近于原本。二是宋版书大多精于校刊。古书传抄愈久，讹错愈多，不加校勘，内容就会失其真。而宋人最注重校勘，如宋敏求，“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晁公武，

“日夕穷以雌黄，校讎舛误”；马端临，“皆亲自校讎，分类精当”。三是名家书体上版。宋版书一般都用唐代书法名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这些人的字，有的秀雅古劲，有的笔势生动，有的从容大度。四是刻工精美。宋代刻书的地方很多，其中刻工最佳者是浙江的杭州（图7），其地文化荟萃，良工云集，刀法首屈一指，连朝廷刻书，也往往到杭州雕版，后来杭州成了南宋的首都，刻书就更有名了。五是纸墨精好。宋人印书喜欢用椒纸、竹纸，这类纸白洁如玉，两面都光滑，墨的色泽鲜艳，油光可鉴，为后世藏书家所宝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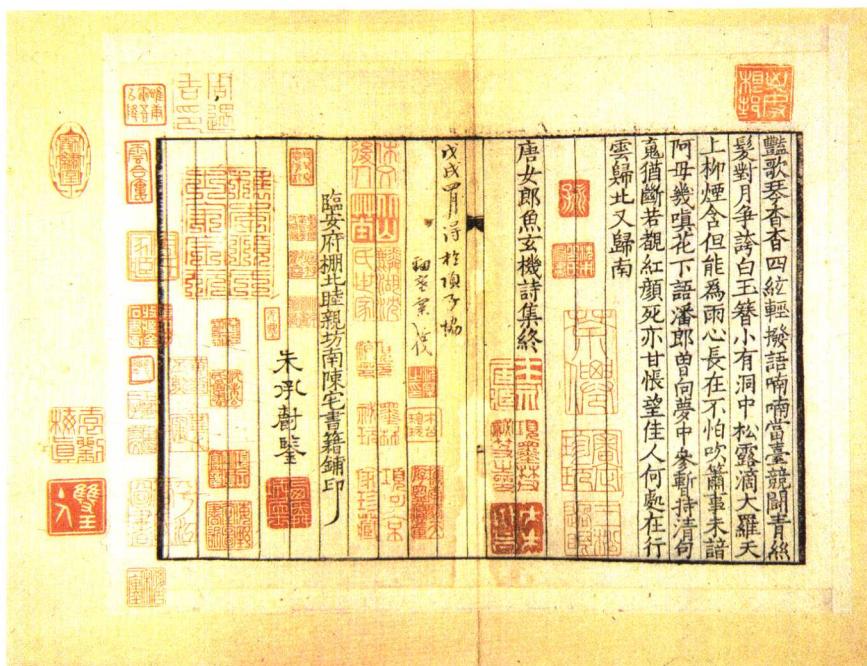
西夏是我国西北古代党项羌族建立的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兴起于唐末。西夏

大庆元年（1036），景宗元昊继承父位，命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西夏文字从德明时期开始创制，到明代中叶彻底消亡，大约经历了460余年的流传使用过程。在本世纪的西夏考古中，陆续发现了一些西夏时期用活字印刷术印刷的西夏文图书，其中《维摩诘所说经》为泥活字印本，其余皆为木活字本，这些木活字本书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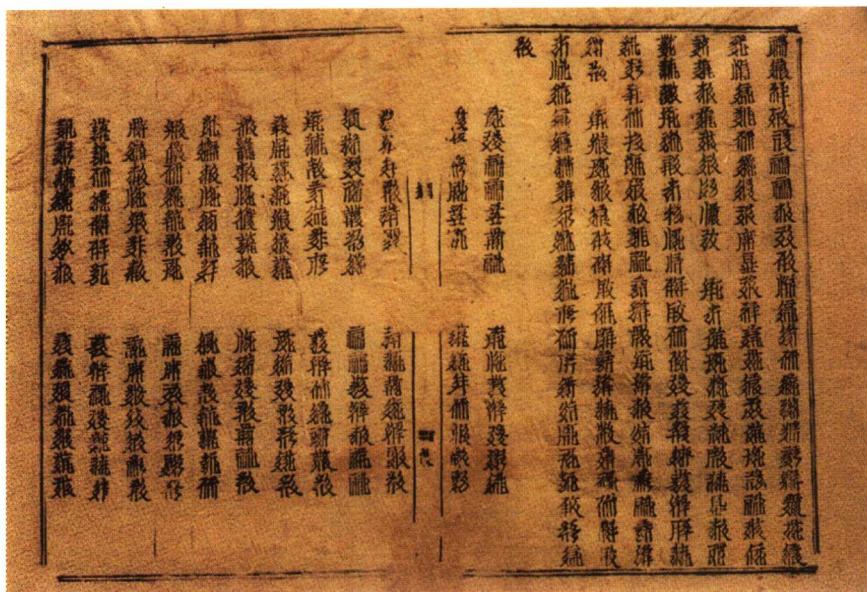
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国。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契丹人在有文字之前是以刻木记事，立国之后，依照汉字先后创制了契丹文大、小字。辽代佛教盛行，并广泛传播。辽政府多次大规模整理、刊印佛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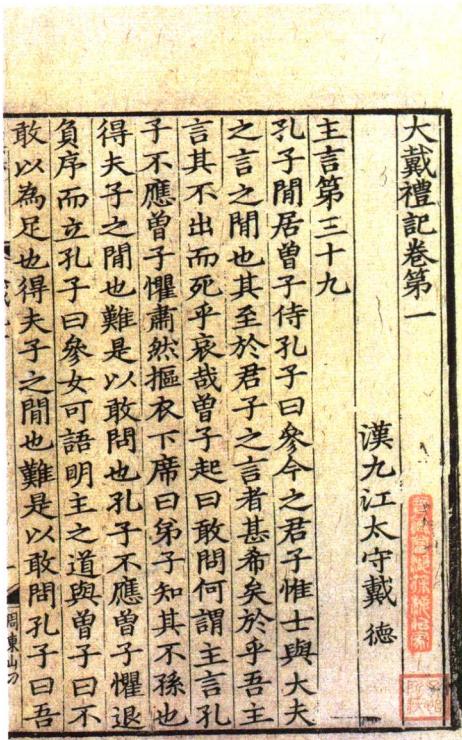
6. 北宋开宝六年（973）刻大藏本



7、宋临安府（杭州）陈宅书籍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



8、西夏文活字印书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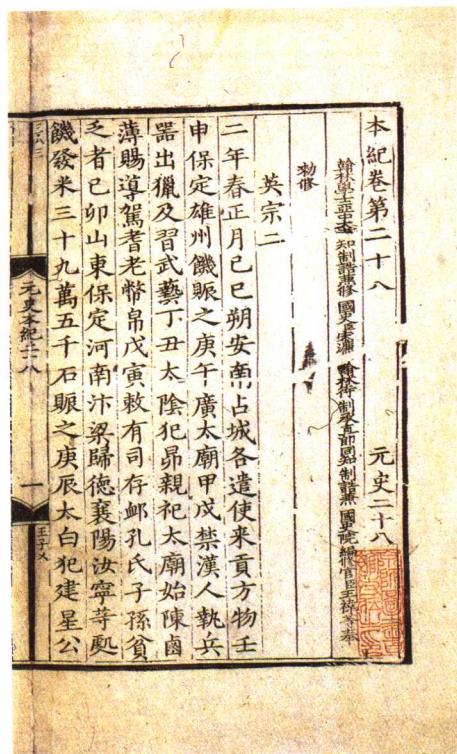
9、元至正十四年嘉兴路儒学刻本《大戴礼记》十三卷

修建佛寺、佛塔，鼓励佛教发展。辽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还由官方主持，开始刊刻大藏经，至道宗后期方才完成，历时凡数十年，这就是著名的《契丹藏》。

公元1115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金人初无文字，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始在契丹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女真大字。

元代是中国书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北方出版的官刻本，以中央官府兴文署的刻本为最著名。兴文署是元代政府机构中掌管刻书的机关，其中最早、最好的刻本

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刻的《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通鉴释文辨误》十三卷（图9）。国子监的刻本有延祐三年（1316）小字本《伤寒论》十卷。北方出版的坊刻本，主要的是宋德方的弟子秦志安在平阳玄都开局校刊的《玄都宝藏》。元代南方的出版业，主要是福建、浙江和四川三个地区，尤以福建建宁（包括建安、建阳两县）最有名，这里是南宋刻书业的中心，也是书坊聚居的地方。佛经出版方面，杭州南山大普宁寺于元初刊印的《大藏经》，世称《普宁藏》。西夏藏经（《河西字大藏经》）也是大德年间



10、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二百一十卷

(1297—1307)杭州大万寿寺刻的。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藏有南宋国子监的四部书版二十多万片，南宋亡时，没有运到北方。宋、辽、金三史都是由西湖书院刊行；此外，许多监本书也是这里刻印的，刻印俱精，字体优美，行款疏朗悦目，为元版本中的代表作。

明代的内府刻书的主要机构由司礼监主持，下设经厂，专司刻书。嘉靖时，司礼监所属的刊字匠、刷印匠和黑墨匠就达600余人，规模很大。刻书内容以推行文治政教为主，包括典章制度、史籍和鉴戒之书等（图10），如洪武刻本《御制大诰》、《大明集礼》、《祖训录》等。据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载，刻书达154种。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由内府主持刊刻的洪武《大藏》、永乐《北藏》、正统《道藏》等宏篇巨帙。

经厂和南、北国子监，在当时并称为三大刻书中心。国子监是明代中央官学，永乐以后有南、北之分，一在应天府（南京）；一在顺天府（北京）。南京国子监

的刻书，其一为修补缺损书版。南监的书版在元代就曾修补过，入明以后又多次修补。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以国子监书版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督匠修治。赵俊奉诏监理，古籍始备。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校正经书刻版，印行于天下学校。此类版本称为“南监本”；迭经宋、元、明三代修补者，称为“三朝本”。北京国子监的刻书事业，自成祖迁京后兴起，万历以后渐入盛期而逐渐取代南监的刻书地位。主要是依据南监的书版重刻了一些书籍，如《十三经注疏》、《廿一史》，还有《四书集义》、《临川文集》、《国子监志》等，数量不多，有40余种。明成祖时，编纂过一部超越前代的大型类书，动用了2169人、花费六年时间修纂了《永乐大典》（图11），这是未曾发刻、仅有写本和抄本的巨帙。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辑入书籍7000—8000种，约3.7亿字，装成11095册。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书史的顶峰，其刊刻书籍的总量超过历代，其中最大的举措就是纂修《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集乾隆以前古籍图书之大成，部头会很大，不能利用已有建筑，必须另建藏书楼以贮之。于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命杭州织造寅著考察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情况，接到了寅著考察的奏折以后，决定在四处皆仿天一阁的结构和样式分别修建藏书楼，并命名为：紫禁城的为文渊阁（图12），盛京皇宫的为文溯阁，圆明园的为文源阁，避暑山庄的为文津阁。这四阁因在北方，称北四阁。后乾隆皇帝考虑到江苏、浙江是人文荟萃之地，为了让读书人能看到《四库全书》，



11、明嘉靖内府写本《永乐大典》



决定再抄三份，分别藏于江苏的扬州、镇江和浙江的杭州，并分别命名为文汇阁、文宗阁和文澜阁。

清王朝所刻官藏名《乾隆版大藏经》，开雕于雍正十三年（1735），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全藏共收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这部大藏主要供颁赐之用，故印本较少，比较稀珍，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惟一版片尚存的一部。

进入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线装书的刊刻日渐稀落，被西方传来的新式印刷技术所取代，内容也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大不相同，虽仍有些文献家刊刻传统典籍，但已不是书史的主流，在此不再赘述。



12、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三鱼堂四书大全》

二、藏书起源及历代王朝对藏书之重视

据文献传说，我国在三皇五帝时代已出现了文字和书籍，如《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尚书·多士》曾载周公对殷民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商王朝从商汤开始便有典籍。刻辞甲骨是今人所见的商王室所藏的最丰富的原始文献，已出土的共约十五万片，约一百万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周原遗址发掘出一座西周早期大型宗庙基址，并在宗庙西厢房“H11”和“H31”号窖藏坑内，先后出土两批分层摆布的甲骨，共有先周卜甲、卜骨一万七千四百多片，清理出有字甲骨二百十多片。这一发掘成果说明了在周代，政府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收藏文献，故此发掘地也可以称之为现存最早的政府图书馆遗址。它比两河流域亚述王国的皇宫图书馆至少要早约六七百年，比古希腊的私人图书馆要早约一千年，比古罗马的将军图书馆要早约一千二百年；而和古埃及的阿玛尔那王室图书馆所处年代大致相当，可并列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

治世修史，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古代“二十四史”有八部正史均成于唐初，然而，修史必须借助大量的图书资料。如《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载，唐初“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遗，德棻奏请购

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显然，令狐德棻从事的购书、写书活动，为唐初修史提供了资料保障。从史家进行史书修撰实践来看，任何一部优秀史书，都是在占有大量真实资料基础上完成的，这就必然促进官府藏书、私家藏书的发育及成长。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在文化上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宋史·艺文志》言：“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旧唐书·太宗纪》载：“太宗入据宫城，令萧瑀、窦轨等封守府库，一无所取，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

隋唐时期，佛经的抄写极为盛行（图13），并产生了大藏经，佛教“大藏经”一词最早出现在隋释灌顶《隋天台智者大

师别传》中，文内有曰智者大师共造“大藏经十五藏”。从图书学角度来看，大藏经是一套大型丛书，佛教“大藏经”，

“藏”是容物的意思，“经”是贯穿的意思，“藏经”两字组合便成为佛教经本结集之总书名。宋代官府藏书的数量据《宋史·艺文志·总序》考核登录：

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宋代皇宫内有专门收藏皇帝御笔御札及供皇帝阅读使用图书的处所，主要有皇宫后苑的太清楼、内侍省系统的翰林御书院以及专藏御制文集、御用图书的龙图阁等殿阁。太清楼始建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八月，王应麟《玉海》卷一六四《咸平太清楼》称“贮四库书，楼下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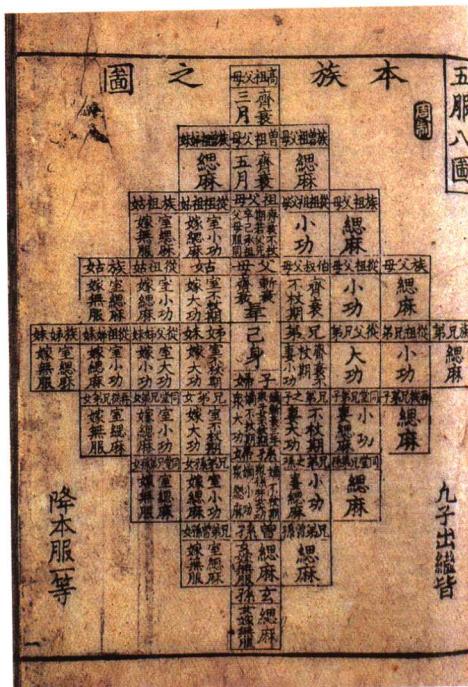


13. 唐写本《大般若波密多经》

阁，经、史、子、集、天文、图画”。至景德四年，太清楼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四部群书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卷。

元代的图书出版事业，由于元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措施，如崇儒兴学、科贡并举，举贤招稳，以及保护工匠等，客观上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清代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的统计，元代刻印出版的图书计有：经部八百零四种、史部四百二十七种、子部七百六十三种、集部一千零九十八种，共计三百一百四十二种。总元一代，历时不到百年，刻印出版图书如此之多，其成绩是显著的。（图14）

元代官府藏书的主要来源，除承袭金



14. 元泰定元年杭州路儒学刻本《五服图解》一卷

代遗留的典籍外，大部分是从南宋灭亡后取得的。当伯颜命董文炳入临安，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时，董文炳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顺帝至正三年开始修撰宋、辽、金三史时，因文献不足，又下诏求购遗书，求书的重点也在江南。至正六年规定，凡献书的都给以官职。顺帝还派遣司书官到东南录求私藏的汉籍，仅四五年间，收到遗书三十多万卷。

明代哲学、史学以及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都十分繁荣。朱元璋本人文化程度不高，却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明代编纂地方志亦十分盛行，据统计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八年间，所修地方志达二千八百余种。由于明初太祖、成祖以及宣宗等重视藏书，皇家藏书集宋、辽、金、元诸代的国家藏书，又加广事搜求，故极一时之盛，皇家的文渊阁、皇史宬的藏书琳琅满目。

朱元璋立国后，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其余诸子陆续分封为藩王，镇守各地，以夹辅皇室。这些藩王在建文、永乐间经两次削藩，军权尽失，在政治上受到严格的限制，藩王及其子弟不得干预朝政、过问政治，但在生活上却给以优厚待遇。后之各代帝王亦按例分封其子弟为王，在各地建立藩府。由于诸藩被赐多宋元旧版书，这些藩王有的雅好文学，又多饱学之士，为之翻雕刊印，时有佳刻，故遂以刻书、藏书为乐事。以明代藩王藏书而论，其显著特点是分布地域广，藏书数量多，且精本、善本多。同时刻书数量质量亦多亦精，这在中国文化史、藏书史是